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注〉讀後

陸 永 峰

(揚州大學 文學院, 江蘇省 揚州市 225002)

從佛典或域外漢籍中,尋找材料,發現並解決問題,以開拓研究的新思路、新局面,在當前的學術界已漸成新氣候,成就卓著者不少。董志翹先生《〈觀世音應驗記三種〉校注》(按,江蘇古籍出版社二〇〇二年一月第一版,以下簡稱“《校注》”)的撰著,可謂兼而有之。在佛典和域外漢籍的校讀與研究兩個方面,此書都為學界樹立了良好的典範。

《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包括《光世音應驗記》、《續光世音應驗記》、《繫觀世音應驗記》三書。此三書中土自唐以後亡佚已久,著者校注的底本是日本京都府東山區栗田口青蓮院藏平安時代後期的寫本(按,以下簡稱“寫本”)。《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屬於中土佛典中“靈驗記”類的著作,又稱“感應傳”、“應驗記”。這類著作多表現佛(佛教)的神異與靈驗,其目的有二:一為展示佛教信徒對本教的信仰與理解;一為以此勸導世俗,推進佛教的流佈。概而言之,即常言所謂“釋氏輔教之書”,體現著佛教信仰與世俗觀念的巧妙融合。因此,其顯著特點即為宗教性與世俗性。前者可以據以考察古人的信仰世界,其對佛教的接受、融納與改造的方式、程度與結果,是探討佛教中國化的重要資料。後者,可反映出某一階段世俗的語言習慣,其中反映出的獨特的時代、地域,或群體特徵的語言表達形式,為古代漢語研究的深入提供了確實、豐富的語料。佛教靈驗記興於六朝,但彙聚多篇作品,直接以“應驗記”命名的,目前所見還是要從《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始,其重要性是顯而易見的。它對於探討佛教信仰,特別是觀世音信仰,在中土的發生與流佈,考察中古漢語的實際狀況,都是不當忽視的珍貴文獻資料。

眾所周知,一個正確、最為接近原貌的文本是研究工作得以展開,並保證其科學性的基礎。因為依據版本的不當,而導致理解、研究上的失誤,魯魚亥豕的例子已舉不勝舉,毋須贅言。包括《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在內的佛教靈驗記著作理應成為佛教研究和語言研究的重點考察對象,這與它目前受到的關注又是不成比例的。其中主要的原因恐怕還在於其文本本身具有著一定深奧的佛理,以及大量的俗語詞和特殊的語法現象,造成了第一步的閱讀的困難。《校注》一書首先為我們圓滿地解決了這一困難,為進一步的學術研究廓清了道路。

在本書的校勘上,著者能夠細心核對原卷,參稽其他重要的書證材料,特別是原來未被人注意的日本大阪府河內長野市天野山金剛寺藏《諸菩薩感應鈔》寫本。著者反覆推核,精心研勘,對校、本校、他校、理校四種方法綜合運用。不僅糾正了之前學者校勘上的一些訛誤,而且對其原始鈔本中的書寫錯誤也作了勘正,努力恢復了其真實原貌,顯示出紮實廣博

的學術功底與嚴謹細緻的治學態度。如《光世音應驗記》第一則中一段文字：

余昔居會土，遇兵亂失之。頃還此竟，尋求其文，遂不復存。（《校注》第一頁）

“校記”中指出，“頃”字寫本原作“須”。依照寫本，則上下文義殊難連貫。著者乃參照上下文，改定為“頃”。“頃”、“須”，形近而訛，校改後，文意豁然貫通。再如《光世音應驗記》第二則中“何有甚於取弊”一句，“甚”字寫本中原作“其”（《校注》第九頁）。校注者從上下文義、字形，以及文中他證等方面出發，結合以考察之，斷定寫本原作“其”為“甚”之形訛。立論言之鑿鑿，有理有據，確然可信。

作為在中古漢語研究領域成就斐然的著名語言學家，著者在本書中的很多地方的校勘都是建立在對古代漢語語料與特徵的深入掌握與熟練運用的基礎上的。如《繫觀世音應驗記》第二十則中的一段文字：

既被收錄付獄，便至心誦《觀世音經》。得十餘日，欵白晝見觀世因，問李：“何以不去？”具答：“不能得。”又曰：“但起。”而鎖即已脫地。於徑直歸家。獄官及守防人都自不覺。（《校注》第一〇三頁）

本書著者在代前言《〈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重新發現及研究》中，詳細交待了此處的校勘經過。在此之前，有學者在“於徑直歸家”的“於”後面，補一“是”字，認為是誤脫。本書著者則引清劉淇《助字辨略》、敦煌遺書等材料為證，指出“於”為“於是”的省文，在《觀世音應驗記》中凡四例。故“於”不應當添為“於是”，應仍從寫本，體現出著者在中古語言研究上的紮實功底和卓越見解。再如《繫觀世音應驗記》第六則中“於是覺脚下如踰柱物”一句，“踰”字寫本原作“踰”，研究者或釋此處“踰”為踩、踏之義。本書著者指出，“踰”在文獻中無表“踩”、“踏”的用例，寫本中四處“踰”字實為“踰”之形訛，而“踰”即“踰”的異體。著者首先從古代辭書、文獻用例出發，明確“踰”即“踰”的異體；又從鈔本的鈔寫情況、唐宋寫本的常例、日本鈔寫者的狀況出發，進一步推斷寫本中四字都當作“踰”，為鈔寫之誤；最後，再從其他材料的異文中，舉證“踰”與“踰”的替用。這樣，內外結合，有力地證明了自己的觀點，消除了已有的誤解（《校注》第七十二頁、第十五頁）。《校注》一書中，諸如此類體現出著者嚴謹的治學態度與紮實的學術功底的例子所在皆是。其個別地方的校勘，如《續光世音應驗記》第一則“曾見傅氏所錄，有契於心”兩句，“曾”字寫本作“食”，著者據文意改為“曾”（《校注》第二十八頁）。此處或可改為“會”字，“會”、“食”兩字形體或更為接近，文意上也似更為暢順。但微瑕不足以掩瑜，著者在校勘上的嚴謹性和科學性最終使得本書成為《觀世音應驗記三種》迄今為止最為接近原貌、最為可靠的本子。

著者在中古漢語研究上的非凡學力也突出地體現在本書的注釋中。能夠廣稽衆書，精思覃慮，結合書內與書外，融貫各方面的知識，對著作中的特殊的語詞，包括俗語詞，考證其義，揭示其內在理據，述其源流，並兼及其習慣用法，乃至口語語法現象，都作出了詳盡、準確的解釋。如《光世音應驗記》第一則中“政復”一詞的釋義：政復：中古雙音節假設連詞，表示讓步，乃“即使”、“縱然”之義。“政”又作“正”、“整”；復：助詞，無實義，起調整音節、加強語氣的作用，常用於其他單音節詞後構成雙音詞。作“政復”者，如《北史·西域傳·于闐》：“朕承天理物，欲令萬方各安其所，應敕諸軍，以拯汝難。但去汝遐阻，政復遣援，不救當時之急，是以停師不行，汝宜知之。”作“正復”者，如《三國志·魏書·王粲傳》：“（王粲）善屬文，舉筆便

成，無所改定，時人常以爲宿構。然正復精意覃思，亦不能加也。”《世說新語·規箴》注引《晉陽秋》：“敦曰：‘正復殺君等數百，何損於時？’”（《校注》第五頁）著者不僅交待了“政復”一詞的含義，而且清楚闡明了它的語法屬性，並通過恰當的例證說明了它的變體的使用的情況。

再如《繫觀世音應驗記》第八則中“半漲”一語，著者發其新義，指出“半漲”爲“渡湖一半，到達湖中央”之義。在隨文的注釋與代前言中，著者闡明了其如此釋義的依據。著者指出“半”爲動詞，“漲”爲名詞，指“大的水泊、水流”，兩者結合爲動賓結構。並例舉了《廣韻》、《集韻》，以及六朝文獻的用例，來證明自己的觀點。對語詞的內在理據與語法特徵都作了詳盡的說明，極爲方便我們的理解與閱讀（《校注》第七十七頁）。再如“方便得下”（《校注》第一百八十三頁）；“且誦且念”（《校注》第二十頁）；“還”（《校注》第二十三頁）；“了自不損”（《校注》第二十六頁）；“飡”（《校注》第六十二頁）等等語詞的解釋，都體現著這一特徵。著者這種從古代漢語的大背景出發對文中語詞的解釋，使得其意義不僅在於對語詞本身的釋義，而且也在於對中古辭彙、語法知識的闡明，爲學術界中古漢語的研究提供了推動力。

對文中涉及到的名物詞，包括對讀者而言較爲陌生的佛教用語、俗語詞，著者也都追根溯源，鉤稽原始，結合多種文獻，從社會、文化的背景上說明其意義，使人於其義能當下豁然暢達，了無挂礙。如《續光世音應驗記》第三則中“周旋”一詞釋爲“友人、朋友”義。著者對它的內在理據作了揭示，指出這是由其原來的“交往”一義引申而來（第三十八頁）；《繫觀世音應驗記》第二十二則中“一月日”一語的解釋，則聯繫了中古的曆日制度，闡明了“一月日”與“一月”的區別。再如“劫”（《校注》第八十三頁）、“叉手”（第九頁）等等語詞的釋義，都體現了著者在本書注釋中一以貫之的廣泛聯繫、深入探討的治學風格，體現了著者在古代漢語、佛教等等多個領域的卓越的研究能力和成就。著者在書中的這種努力，從小的方面而言，有利於讀者全面地了解語詞的含義與用法，有利於對文本的深入理解；從大的方面而言，則爲我們補充了關於古代漢語的辭彙、語法方面，乃至文化方面的廣泛知識，有著舉一反三、觸類旁通的意義。它不僅利於我們糾正謬誤，掃除閱讀上的障礙，而且也利於其他學者能夠更爲方便地對之加以利用，推動研究的展開與深入。

本書著者在校注過程中所具有的客觀、嚴謹的治學態度，還體現在對於很多缺乏證據，難以確言的語詞與事類，都不是妄下結論，而是抱以存疑闕如的科學態度。如《續光世音應驗記》第九則中“法宋法師”（《校注》第五十五頁）、《繫觀世音應驗記》第七則中“歐陽火”（《校注》第七十五頁）、第十六則中“明僧駿”（《校注》第九十四頁）等的釋義，都是這一方面的明顯的例子，再一次說明了本書在學術研究上的典範意義。

本書的翻譯部分也能實踐常言“信、達、雅”的原則。在遵循本文的基礎上，做到了文字的潔淨雅飭與生動流暢的和諧，有著雅俗共賞的藝術效果。

《校注》一書，不僅爲我們解決了閱讀上的困難，提供了一個真實、正確的版本，而且著者高屋建瓴，指點迷津，爲後來者啟示了《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重要學術價值，指明了研究、利用它的準確方法與途徑。這集中反映於著者寫在本書前的《〈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重新發現及研究》（代前言）之中。因爲學有專攻的原因，著者的論述主要集中在語言學方面。在以精簡的筆墨敘述了《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緣起、宗教學的意義，以及其傳寫情況之後，著者以大量的篇幅對其語言學的價值作出了詳盡而深入的論述。著者指出，《觀世音應驗記三

種》包含了豐富的語料和語法現象，在三個方面對中古漢語的研究有著“彌足珍貴”的意義：一、《觀世音應驗記三種》含有豐富的中古漢語辭彙，對於中古漢語辭彙研究，包括義項、語源、俗語詞等，都意義重大，對於大型語文辭書的修纂也大有幫助；二、本書中有大量俗字，可據以考察當時漢字的使用情況；三、書中還包含不少值得注意的中古語法現象。這三個方面的說明建立在著者對本文的充分把握與對中古漢語的深入了解的基礎上。著者通過大量豐富、準確的例證，以深入淺出、條分縷析的論述，對《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研究價值作了透徹、細緻的揭示，再一次顯示了著者在中古漢語研究方面的深厚功力與遠見卓識，及對本學科研究的新趨勢、先進方法的準確把握。同時，也為我們指明了進一步研究、利用《觀世音應驗記三種》的正確的方向與途徑，使後來之研究者因之而獲益匪淺。

本書在體例上還有不少可汲取的地方，比如說在每一則故事之後附有“參見資料”，交代與本文相關的文獻，或引用，或涉及，包括書末的附錄、以及語詞索引。這些對於閱讀與研究本文而言，都是大有裨益、值得贊許的地方。

《校注》一書，在文獻學與語言學兩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學術成就，有著重要的啟示意義。它的成書、出版，對於佛教研究領域的拓展、中古漢語研究的深入，都具有重要的推動作用。我們期待，在古籍整理領域，能夠有更多的像《校注》一樣，既為我們提供了正確的本子，同時又揭示了研究方向的著作，不斷地面世。這對於學術研究而言是一件功德無量的事情。

陸永峰(1972—)，男，江蘇崑山人，揚州大學文學院副教授。